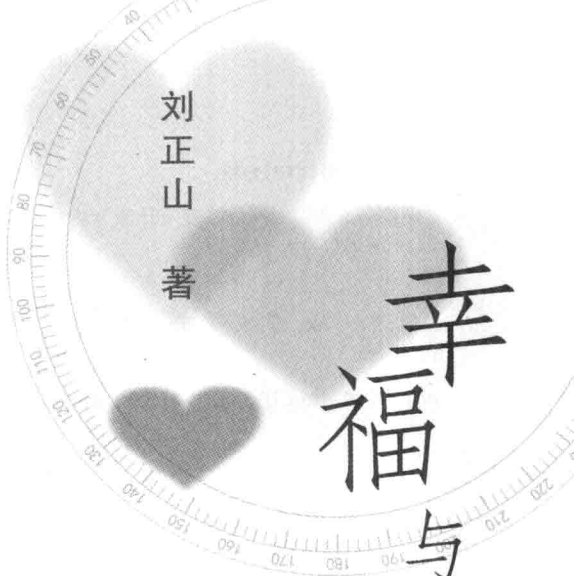


刘正山 著

Happiness and Happiness Index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幸福 与幸福指数

理论构建与计量分析



幸福

与幸福指数

Happiness and Happiness Index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理论构建与计量分析

刘正山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与幸福指数：理论构建与计量分析/刘正山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476-0814-2

I. ①幸… II. ①刘… III. ①幸福—文集
IV. ①B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8887 号



幸福与幸福指数

理论构建与计量分析

刘正山 著

策划人/徐忠良 责任编辑/陈占宏 祁东城 封面设计/张晶灵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200235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昆山亭林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装订：昆山亭林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0.75 插页：2 字数：175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6-0814-2/F·508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38

自序

追求幸福是人的一项基本目标，
幸福和福祉是全世界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目标和期望。

——联合国大会第 66/281 号决议

近年来，国际上有关“幸福”研究的文献急剧增加。不过，各家的研究各有侧重。有的学者是为了超越 GDP；有的学者是为了心理治疗的更佳效果；有的是从个人学术研究兴趣着手；有的是从官方角度倡行新政绩观，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

我于“幸福”的关注，视角与其他学者不同，且属偶然。十几年前，我出于好奇写一篇追查“经济学”(Economics)来龙去脉的文章，发现“经济”最早指称“家政之术”。其内涵是：一个单一的决策主体从各种各样的目标中选择一个指标，并向着这一目标有意识地将自己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手段(资源)进行分配。由此对照，现代经济学显然偏离了这一目标，而且走得太远。现代的“经济”一词，是在宏观层面上使用的，超越了最初意义上的“单一主体”“单一尺度”。一旦过渡到多个主体、多目标，经济学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纵观各类经济学教科书，广为接受的一个定义是，“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将稀缺资源用于最有效的用途(即资源配置)的一门科学”。这一定义仅仅告诉我们“经济学”是什么，却没告诉我们“经济学”是为了什么而存

在。鉴于此,在2007年1月出版的《幸福经济学》一书,我提出,既然经济学无法解决宏观问题,建议回归传统,并着眼于两个主要分支,其中一个就是研究单个决策主体对于自己人生(包括爱情、家庭、人生道路、工作与休闲等等)的选择(权衡),即幸福经济学。

从2009年开始,我参与吴晓灵(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主持的“中国民生指数”(曾名幸福指数、福祉指数)课题研究。经由大量的调研与思考,我更加坚定地认为:现代经济学,只有微观部分的一部分思想是可取的,只要涉及人际比较,就困难重重;至于宏观问题,一旦涉及经济增长和经济预测,便难有斩获。

此后,我参加了不少研究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幸福指数相关课题评审会并担任评审专家,自己也主持了一些幸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之类的课题研究,也曾专程到不丹就幸福问题与不丹国家研究院院长 Dasho Karma Ura、GNH 委员会秘书长 Karma Tshiteem、首相 Lyonpo Kinzang Dorji 等进行交流。

在相关研究与实践工作中,我日益发现,把握“幸福”的内涵,需要“正本清源”。“幸”与“福”都是中国文化中最古老的愿望,在古代汉语中,“幸”与“福”是分开使用的。

“幸”,本义为意外地得到好处或免去灾害。“福”,在甲骨文中,意为报答神之赐福或求福于神。

传统上,“幸”与“福”虽然有并用的案例,却不是现代的意义。早在晋代《嵇中散集》卷九中就出现了“幸福”的用例,是“祈望得福”的意思,和我们当今使用的“幸福”含义不同。

应该说,在19世纪末之前,中文并未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幸福”一词。“幸福”的出现,不过百余年的历史。根据我掌握的资料,现代意义上的“幸福”一词,大约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才出现的。

对中西文化颇有研究的钱钟书,在《七缀集》中评论林纾的翻译时说:“流行的外来新名词,像……‘幸福’……等应有尽有了。”由此可见,“幸福”是外来语,而且当时较为流行。查阅文献发现,“幸福”这个词语,林纾是用在1908年版的《玉楼花劫》第4章。此前,也有“幸福”的用词,如魏源(1794~1857)《默觚·治篇》:“不幸福,斯无祸;不患得,斯无失。”《严复集》(1906):

“乃今幡然而议立宪，思有以挽国运于衰颓，此岂非黄人之幸福！”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幸福”，可以由单字“幸”来替代。

因此，要把握“幸福”的内涵，需要从其本来的意思入手。按照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的解释，“幸福”(well-being, 也被译为“福祉”)是指：(1) the state of being healthy, happy, or prosperous (即 Subjective Well-being 或 Happiness); (2) welfare. 也就是说，幸福由“快乐”或“主观幸福感”(Happiness 或 Subjective Well-being)和“生存境况”(Welfare)构成。“生存境况”，既有客观的“处境”之义，也有受到客观处境影响的主观“心境”之义。简言之，幸福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从而，可将“幸福”划为两个维度：良好的生存条件，良好的生存状态。阅读英文文献，不难发现，多数实证分析使用“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来代表“幸福水平”，尽管如此替代测度存在诸多问题。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就曾公开表示：“必须调整幸福的概念。”

在测量幸福或曰进行幸福指数的构建与分析中，需要对“幸福”进行“精细化”的界定。应该说，目前，幸福研究仍处于“草莽时期”。如果大家不在同一“平台”上对话，难免各说各话。在此，有必要对我所认为的“幸福”内涵做进一步的阐述。

第一，幸福应当包含不幸福。积极一面的，如幸福感，本来就包括它自身的反面。反过来，表现出消极一面的，如不幸福感，就保留了自身一些积极的东西。古人的“福祸相倚”思想，很有参考意义。因此，我主张，在问卷设计中，要直接问及是否“满意”和“不满意”。如果一个人确实处于“不幸福”的境地，绝对不会回答说“我很幸福、很满意”，而是说“不幸福、不满意”或者碍于“面子”而回答说“还凑合”或“一般”。

第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仅仅描述了幸福的层级。假设偏好内生，那么，随着知识的增长，每个人的需求范围将扩展，对需求质量的要求也提升，需求范围是基于知识或禀赋所导致的总需求，包括过去、当下与未来的需求。随着知识的增长，个体的需求范围将扩展，对需求质量的要求也提升。假设有两个在同一家庭同时出生的人，其中一个没有上学，那么，长大之后可能只能靠出卖体力，在工地上干苦力谋生；另一个则经由上大学，在

银行找到一份职位。那么,这二人的需求范围必然不同。二人由于成长的环境及后天学习的变化,对住房的布置、娶妻取向、休闲爱好、为人处世、饮食偏好等等方面,将产生差异。上过大学的可能喜欢看歌剧,没有上学的则喜欢看花鼓戏;上过大学的可能喜欢喝红酒,没上过学的则喜欢喝烧酒……显而易见,一文盲于月夜之下漫步于竹林,恐怕难以欣赏这美景;可是,饱读诗书者,却会觉得心旷神怡,并借“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来抒发。因此,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有句名言: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胜过做一头快乐的猪。

当然,这种需求的“范围”应当“适可而止”。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表明,欲望不可过分,可望不可及的欲望是海市蜃楼,否则,幸福追不上消极影响。但这公式也容易导致“禁欲”的结论。

第三,幸福应该是主动的、积极的行为和结果。经由吸毒、彩票中奖等等被动方式获得的满足,可以暂时获得心理上的愉悦,暂时缓解痛苦,但是就长期趋势而论,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满足这种欲求变得愈来愈困难。这好比说,爱好收藏字画的人,给他一幅齐白石的画作,他非常兴奋;再给一幅,则没那么兴奋了。基于边际效用递减,需要更多的画作才可能获得第一幅那么多的满足,但是,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所以,被动式的消极方式在让他获得短暂的满足的同时,也在制造更多更大的匮乏。

如果采取的是主动的、积极的行动,获得的满足是持久的,则是幸福的。欣赏《二泉映月》之类的音乐,尽管当时忧伤而落泪,但心智上是快乐的;当我们对一项工作或目标付出血汗,不论是否成功,结果都是幸福的;去禅修或旅行,也是一种欢乐的体验,将提携心灵,带来满足,鼓舞前行。陶渊明说:“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忘忧”,获得的是内心的充盈。

第四,幸福不能仅局限于心理上的愉悦。生活中存在的忧伤、劳顿或痛苦,不等于不幸福!当欣赏曲调悲伤的音乐,沉浸在痛苦之中时,能说你是不幸福吗?运动员争夺金牌的过程中,挥汗如雨,疲惫而痛苦不堪,也是不幸福的吗?其实,人生面临无数的选择,但是,主流经济学只研究如何做选择,并不研究选择之后该如何。我主张每个人理性选择之后,要坚持实施下去(详见我的《寓言经济学》一书)。有时候,过程比结果重要。

与此同时,心理上的愉悦,并不等价于幸福。一个人沉迷于赌博之际,心情愉悦,但他很“不幸”。我常说,心理上的愉悦相当于天空中美丽的风筝,但幸福是手中的那根线。

第五,幸运之福气(传统语词“幸福”之义),也不等于“幸福”。一个人购买彩票中大奖,是为幸运或快乐,但难以确定他从此以后是否幸福;一个人可能如塞缪尔·约翰生的《幸福谷》中的王子那样生于豪门且生活富足、平和而安康,但是却不一定幸福。反之,居于陋巷之中的颜回,安贫乐道,可能是幸福的。

界定清楚“幸福”,是进行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构建、进行学术研究等的基础。不过,多年以前撰写《幸福经济学》一书之时,我并未想过要进行幸福的理论创建,也没有想过要进行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分析,我当时只是觉得,人类的幸福是经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该书试图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回答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人应该怎样活着”,即决策主体如何对其人生进行最优选择。换句话说,《幸福经济学》主要从“应用”角度,讨论并试图告诉大家怎样做选择以实现幸福极大化。

读者眼前的这本书,虽然也注重“应用”,但也只是侧重于“幸福指数”的构建与应用,更多的精力则投注到幸福的理论分析上。以下对本书收录的论文(未予注明,则为本人独著)予以简要介绍。

《中国人的幸福观:基于24个城市的调查与初步分析》 试图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挑选出那些人们最关心的指标,并将其纳入指标体系。同时,从三个不同角度(“幸福观”重要性评分及其分布,“幸福观”的分组比较与分析,幸福要素与个体特征的综合分析),以期解读中国人的“幸福观”。

《主观幸福感的客观影响因素再检视——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课题问卷数据的分析》 目的是筛选那些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剔除不重要的变量。本文发现,不同的客观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水平的影响不同;现行一些统计指标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如“商品抽样合格率”不能反映食品安全情况,“登记失业率”严重偏离实际,等等。

《幸福指数及其构建——基于中国民生指数的扩展研究》 评介了中国有关幸福指数的研究和实践的进展,并运用中国民生指数的相关研究,综合我对幸福指数的理解,新构幸福指数,并将其与GDP、HDI等相

关指标进行比较分析。限于当时行文的局限,本文的幸福指标体系仍存在不足。

《“幸福-收入之谜”的新古典经济学解释》 “幸福-收入之谜”是美国学者于1974年提出的,相关解释颇多。本文通过将“货币单位”与“收入”区分开来,并考虑时间因素,对“幸福-收入之谜”进行了新的解释,即:由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得自收入的边际幸福感受趋于下降。严格地讲,本文没有新观点。

《哪些中国人不幸福——基于空间计量及 ordered probit 模型的分析》 (作者为刘正山、彭鹏)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考虑地理相邻和民族文化因素的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发现地域并不显著影响主观幸福评价,而经济水平和民族文化因素是更显著的影响变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 ordered probit 模型。分析发现,伴随着 GDP 的快速增长,中国居民整体幸福感受略有下降。在此基础上,分析发现了感觉“不幸福”的居民个体特征及分布特征,并给出初步解释。

《主观幸福感测度:转换系数的引入与验证》(作者为刘正山、彭鹏) 幸福的经济学分析,特别是幸福指数的构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主观评价的人际比较,甚至包括自我比较。本文试图提出一个解决思路:寻找可以联接主观与客观的“桥梁”——“转换系数”,将无法实现人际比较的主观幸福感转变为可以直接比较,可以进行四则运算,并实现主客观指标可合成的情形。

《城市政府施政理念创新与居民幸福感增长——一个转换系数的视角》 本文着眼于中国内地关于“幸福指数”的研究迅猛增加,分析了一种新的城市施政理念创新趋势。文章评价了“经营城市”的功过是非,分析了各地创建“幸福城市”的实践,揭示了一些地方政府编制的幸福指数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从“转换系数”的角度,构建了幸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分析。

《需求范围理论——对“学历-幸福悖论”的初步解释》 “学历-幸福悖论”是说,随着学历的升高,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升。本文认为,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时候,高学历者的需求范围更广,而满足程度的要求趋高。如果高学历者的“满足程度”相当于或超越低学历者的数值不足以抵消需求范

围之差别,那么,其幸福水平将低于低学历者。当且仅当高学历者的“满足程度”超越低学历者的数值足以抵消需求范围之差别并有盈余,其幸福水平才高于低学历者。其中,外生变量(包括预算约束、各种幸福因子的实现程度)变得很重要。

为了让更多的研究者和关注幸福的人士了解国外的幸福研究进展,我撰写了两篇介绍和评价海外幸福指数及GNH应用实践的论文。其一,《从“GDP式发展观”到“幸福观”——主要国际组织与国家幸福指数编制实践概述》。文章首先回顾了海外对于“GDP式发展观”的反思,其次描绘了由“GDP式发展观”向“幸福观”转变的历程,然后介绍了有代表性的国家(如法国、英国、日本、不丹)和国际组织(如OECD、联合国、欧盟)发布的幸福指数相关评价指标体系的情况。其二,《国民幸福总值及其对国际规则体系的影响》(作者为刘正山、贾晋京)。随着国民幸福总值(GNH)走上国际舞台,现行国际规则体系正在被重新设计。本文分析了国际规则体系新博弈的路径、影响,博弈规则及其缺陷,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此外,本书还附录了联合国有关幸福的三份决议的中文版全文,分别为:《联合国大会第65/309号决议:“幸福:走全面发展之路”》;《联合国大会第66/281号决议:“国际幸福日”》;《联合国大会第67/697号决议:“幸福:走全面发展之路——秘书长的说明”》。

近年来,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埃里克·拜因霍克(Eric Beinhocker)、杰恩·菲利普·布绍(Jean-Philippe Bouchaud)等等众多学者纷纷提出,经济学理论遭遇变革风暴,经济学将变革。但是,正如萨拜娜·阿尔克(Sabina Alkire)所说,“经济学已准备好进行一场改革,但如何改还不清楚”。我想,基于人类幸福和福祉的新型经济学,将为经济学的变革提供模式、框架和可贵的机会。

本书是《幸福经济学》一书的延续、深化和重构,但更加偏重于理论分析,特别是试图做些理论创新的努力,如重提基数效用论、构建“转换系数”、提出幸福的需求范围论,等等。这些创新,我不敢说为经济学的变革和幸福理念的传播作出多大贡献,成绩或许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存在很多错漏,但我们一直在努力。

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研究幸福问题。祝愿最大多数人实现最大限度的幸福。

刘正山

2013年12月于北京

目录

自序 / 1

哪些中国人不幸福?

基于空间计量及 Ordered Probit 模型的分析 / 1

主观幸福感测度: 转换系数的引入与验证 / 18

城市政府施政理念创新与居民幸福感增长

一个转换系数的视角 / 30

幸福指数及其构建

基于中国民生指数的扩展研究 / 50

主观幸福感的客观影响因素再检视

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课题问卷数据的分析 / 63

“幸福-收入之谜”的新古典经济学解释 / 73

需求范围理论

对“学历-幸福悖论”的初步解释 / 84

中国人的幸福观: 基于 24 个城市的调查与初步分析 / 97

从“GDP 式发展观”到“幸福观”

主要国际组织与国家幸福指数编制实践概述 / 117

国民幸福总值及其对国际规则体系的影响 / 131

附录 / 144

联合国大会第 65/309 号决议: “幸福: 走全面发展之路” / 144

联合国大会第 66/281 号决议: “国际幸福日” / 145

联合国大会第 67/697 号决议: “幸福: 走全面发展之路
——秘书长的说明” / 146

哪些中国人不幸福？

基于空间计量及 Ordered Probit 模型的分析

内容提要：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奇迹般的高速增长，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否同步上升，这在学术界争议颇大。本文在 Easterlin(2012)和 Brockmann et al. (2009)等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考虑到中国文化因素，纳入“不幸福”的分析，从更广义的角度考虑“幸福”，并从不同维度刻画幸福和不幸福；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差距大、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等因素，主张采取复杂抽样调查和大样本数据，以便更精确的反映实际。本文运用“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的连续两年、覆盖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兼顾城镇和乡村的共 10 多万个样本的问卷数据，首先构建了一个考虑地理相邻和民族文化因素的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发现地域并不显著影响主观幸福评价，而经济水平和民族文化因素是更显著的影响变量。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 ordered probit 模型。计量分析发现，从 2011 年到 2012 年，伴随着 GDP 的快速增长，中国居民整体幸福感略有下降。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发现了感觉“不幸福”的中国居民的个体特征及分布特征，并给出解释。

关键词：幸福；不幸福；生活满意度；中国文化

一、问题提出

自 1978 年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长达 30 多年的年均 8% 左右的 GDP 增长率，这被誉为“中国经济奇迹”。即便是 2012 年全球经济表现不佳，中国全年 GDP 仍环比上涨 7.8%，达到历史记录的高点 519 322 亿元

人民币。与此同时,居民收入也迅猛上涨,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343元,2012年却达到24565元,相当于1978年的71倍;2012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则相当于1978年的59倍。(数据来自《2013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居民是否获得同步的幸福增长呢?遗憾的是,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意见不一,认为生活满意度下降、平稳、上升的都有。Brockmann et al. (2009)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在转型中下降,并称之为“The China Puzzle”。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的研究认为,1990~2000年间,中国居民的平均幸福感由1990年的7.3下降到了2000年的6.5,自我感觉“非常幸福”的居民比例也由28%下降到了12%。Easterlin(2012)的研究发现,过去的20年,处于中国收入下层的1/3人群对其生活满意度越来越低,而收入最上层的1/3人群则越来越满意。Kahneman和Kruege(2006)则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不变但也不排除有下降的可能性。两份由盖洛普咨询公司(Gallup)发布的报告(Burkholder R, 2005; Crabtree S, Wu T, 2011)得出了生活满意度平稳的结论。同样得出类似结论的还有来自Knight和Gunatilaka的研究(2011)。

但无论如何,横跨国界的实证研究(联合国,2012)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排名与GDP或者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不够相称:2012年4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比较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中国内地则排名112。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人均GDP排名位居世界第89位。

中国各级政府似乎也认为居民幸福与GDP的增速不同步,开始考虑施政理念的创新,将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为政府的工作着力点。截至2012年底,全国将近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超过100个城市政府将“幸福”作为施政理念,明确提出建设“幸福城市”或将幸福指数纳入政绩考核体系。

我们认为,对于政策的制定者而言,知道哪些群体幸福,并不是重点,最应当关心的是哪些人不幸福,他们的诉求在哪些方面,以便调整执政的思路。对于研究者而言,单纯测算居民的幸福感的有多高,哪些因素影响幸福,只是问题的第一步;如果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不幸福”群体,获知哪些人不幸福,将获得更多的发现。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

关于中国居民幸福感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一般的研究模式是从幸福的定义出发,通过有关机构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计量或统计分析得出结论,然后加以解释。下文从相关研究所使用的幸福衡量方法、问卷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幸福”的衡量

多数实证分析使用“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来代表“幸福水平”。如何测度“生活满意度”?目前,跨国界的研究多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或盖洛普咨询公司的数据。它们主要通过询问被访问者是否感到满意,将所有的问题归结到一个,即“考虑所有因素,你对自己的生活有多满意”。答案为1~10分,越接近1,被认为越不满意、不幸福;越靠近10,被认为越满意和幸福。

尽管这种关于“幸福”的定义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引用,甚至 Stiglitz-Sen-Fitoussi report(2009)也推荐类似的主观幸福感问卷设计:“把所有事情都考虑进去,你对你最近的生活有多满意?请用1~10之间的数字来回答,1表示最不满意,10表示最满意。”

但是,这并不是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衡量方法。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国度的居民,面对调查问卷时,报告的情况不一定能够反映实际情况:有的偏于乐观,有的偏于保守,有的偏于悲观。

一是东亚文化的影响。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居民倾向于奉行“中庸之道”,面对问卷调查时,将偏于“保守”的评价主观幸福感受。那么,单纯问及“目前您是否幸福”,人们倾向于低报评价数值,如回答说“还可以”、“还行”等等。那么,单一的问题将不能反映受访者的真实状况。Lai, Cummins and Lau(2012), Lu, L. and Gilmour(2004), Ratzlaff et al(2000)以及 Bauer(1976)等的研究均揭示了这一点。

因此,要更为接近客观的反映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受,一是应当从不同的角度设计问卷。例如,可以从现状、过去和未来三个不同的维度来刻画,设计三个问题:(1)“总体而言,您对当前自己的生活状态的评价是什么?”(2)“和过去相比,您的生活状况总体变化如何?”(3)“您觉得您未来的生活是否会得到改进?”那么,分析一个人是否幸福,从他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可见。假设一个人的回答分别为:“现在的生活状况还可以;跟过去比,有进步;对未来有信

心”,那么,就可以认定此人是幸福的;假设其答案为:“现在的生活还凑合;跟过去比没什么变化;对未来的信心不太充足”,则可以认为此人不幸福。

二是研究中国人的幸福感,需要同时研究不幸福感。中国文化中的幸福观,有一个明显特征即辩证均衡的观点。“幸福”与“不幸福”就像是硬币的正反面。中国哲学家从最早的“阴-阳”的角度来看待万事万物。(Kim, 2001; Osgood, 1979)他们认为表现出积极一面的(如幸福感)就包括了它自身的反面。反过来,表现出消极一面的(如不幸福感)就保留了自身一些积极的东西。(Kitayama et al., 1997)例如,易经对人生的看法为,人生如卦象流转,必经代表天地的乾坤二卦而生,蒙卦的发芽启蒙,需卦的灌溉成长,达到泰卦的安适境界,但马上伴随代表灾难的否卦出现。也就是说,幸福与危机是一体两面、无法区分的,就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Lu, L., R. Gilmour and S. F. Kao, 2001)。

这一点,中西不同。以往的实证研究得出在欧美这样的个体主义国家中人们会将积极的生活事件最大化,而不会去强调不幸福感的重要性(Ji, Nisbett, and Su, 2001; Lu and Gilmour, 2004)。道理很简单,幸福不仅是对个人努力与付出的最佳酬偿,也被赋予各种正面的联想,如美国人相信幸福的人比不幸福的人死后更可能上天堂。研究者得出在欧洲,幸福感和不幸福感是一种线性增长的关系。而在亚洲,幸福感和不幸福感并不是完全相反的,他们更像是一个事物的两面(Lu and Gilmour, 2006)。

从而,完整的幸福感至少应该是二维结构——幸福、不幸福。实际上,从西方的研究也可以发现,将幸福刻画为三个维度——生活满意感、积极情感、消极情感(Andrews and Withey, 1976; Nettle, 2005; Uchida et al., 2004)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Andrews and Withey(1976)对幸福的定义:幸福感是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及所感受的正负情绪强度所构成的整体评价。这种定义不仅不会忽略人类认知功能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也兼顾了情绪对幸福感带来的影响。

遗憾的是,关于居民“不幸福感”的研究,文献十分缺乏,特别是中国居民的不幸福感的分布及其特征,很少有文献予以关注,除了 Pew 的“生命阶梯”(Ladder of Life)(www.pewglobal.org/category/datasets/)有所兼顾。从我们检索到的文献分析,目前心理学领域主要从三个层面来定义不幸福感:负性的情绪或情感、生活的不满意感和低水平的幸福感。(Pugno, 2007; Haybron, 2010; Shmotkin, 2005)在这些有关不幸福感的心理学的研究中,研究者用测量幸福感的量表来测不幸福感,研究者认为在幸福感量表上低的得分就是不幸福

感的程度。(Tokuda and Inoguchi, 2008; Chang and Nayga, 2010; Pflug, 2009)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文化的特征,由于居民回答问题的时候倾向于保守估计幸福感,所以,按照得分高低情况评定是否幸福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应当在问卷设计中,直接问及是否“满意”或“不满意”。如果一个人确实处于“不幸福”的境地,一般不会回答说“我很幸福、很满意”,而是说“不幸福、不满意”或者碍于“面子”而回答说“还凑合”。

(二) 调查样本

研究中国居民幸福感与经济表现关系的文献,所使用的调查问卷数据,面临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样本覆盖情况。抽样调查结果是否无偏,很关键的一个条件是所抽查的样本是否具备良好的涵盖性(comprehensiveness)。正如 Easterlin(2012)所指出的,大多数研究中国居民幸福感与经济表现关系的论文,都倾向于城市。(Knight J, Song L, 2005; Xu CG, 2011) Easterlin(2012)试图将 World Values Survey、Gallup 以及其他机构的调查数据拼接成 20 年的长周期数据,并且没有使用单一的城市数据,而是尽可能兼顾了城市与乡村的样本(除了一个数据系列之外),以完整地考察中国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但是,Easterlin 所使用的数据样本量过小(1 000~5 500 个),虽然兼顾城乡,也仍难以反映全面情况。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合理的抽样调查应当覆盖全部省份。而现有的研究,抽样地点偏于东部地区,未能覆盖西部或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表 1 中国 GDP 及人口分布情况(2011)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人均 GDP(元)	地区人口(万人)	人口分布(万人)
总和: 521 441.11	标准差: 3 287.53	总和: 134 041	城镇: 69 079(51.27%)
标准差: 13 216.29	均值: 3 924.24	标准差: 3 742.60	农村: 65 656(48.73%)
均值: 16 820.68	中值: 1 851.26	均值: 4 323.91	男: 69 068(51.26%)
中值: 12 582.00	最大值: 8 344.86	中值: 2 769.34	女: 65 667(48.74%)
最大值: 53 210.28	最小值: 1 643.79	最大值: 10 504.85	0~14 岁: 22 164(16.5%)
最小值: 605.83		最小值: 303.30	15~64 岁: 100 283(74.4%)
			65 岁及以上: 12 288(9.1%)

资料来源:《2012 中国统计年鉴》